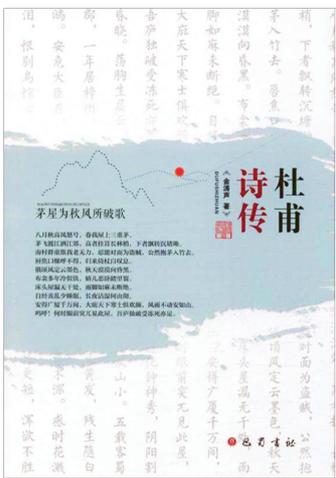


濠上漫与

讲清杜甫离开草堂的缘由

■陈尚君



金涛教授新著《杜甫诗传》

接到宁波大学金涛教授的电话,很感意外,至少有15年没有联系了。马上问年,今年八十二,身体很好,电话里的声音就能感觉出来。金先生告事由,刚在巴蜀书社出了《杜甫诗传》,参取我早年论文《杜甫为郎蜀考》的考述,分析杜甫晚年全部诗作,对杜甫永泰元年(765)离开成都草堂后的经历、心情和诗意,有全新解读。这当然引起我极大的兴趣。拙文初稿写于1979年夏,是我第一篇学术文字;发表于《复旦学报》1984年第一期,至今已35年了。海外据说颇能接受,前几年日本出版杜甫诗注,即从拙说。国内则张忠纲教授曾撰文商榷,陈贻恪教授、莫砺锋教授分别著《杜甫评传》,均注意到拙文,未采信。

先说拙文的主要见解。1979年6月,从朱东润读研第一学年结束,师完成《杜甫叙论》还未刊,出题《大历元年后之杜甫》。大历元年(766)杜甫在夔州,他最后几年诗宋人很推重,师之期待是可理解。我就一年所学,希望有一历练,因将图书馆相关书全借出,用两个多月成文三篇,其一即追索杜甫此前一年离蜀之真相,有清人浦起龙一点点的启发,广征杜甫本人诗,尽翻宋以来之旧案。其二、其三谈杜晚年思想、艺术成就,自觉难突破当时局限,至今仍存于行篋。

宋以来杜甫传记,都说杜甫以检校工部员外郎入参严武剑南节度幕府。永泰元年(765)四月严武死,杜甫失去依靠,蜀中将乱,于是仓促出走。然而杜诗所见行踪与心情,六月已到戎州(今四川宜宾),心情愉快,并不赶路。他在忠州(今重庆忠县)准备赶往江陵,在云安、夔州停留两年是临时决定。吊唁严武诗也作于峡中,很可能

未变,从肃、代二朝贾至、常袞所草制词可以明白。理解此,知道那年春天由于严武奏请,杜甫被召入京任职,他随即买舟东下,于路心情大好。到三峡口的云安,多年旧疾消渴(今称糖尿病)、风痺发作,在《客堂》诗中:“栖泊云安县,消中内相毒。旧疾廿载来,衰年得无足。死为殊方鬼,头白免短促。”危及生命而被迫暂留养病。半年后,迁居夔州两年,耽搁了入朝的期限,被迫漂泊荆湘而终。

10多年前曾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艾朗诺教授谈到拙说,他告洪业先生早在美国授杜甫,也有类似的怀疑,并寄来洪著英文书影。此书经曾祥波教授汉译,201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,写到“诗人究竟是在严武去世之前还是之后离开的成都,这仍然是一个未曾解决的问题”。“因为杜甫没有任何悼念严武之死的作品,这可能表明我们的诗人是在节度使去世、甚至患病之前离开成都的。”立说很谨慎,但也明确地发现,前一年秋冬间杜甫已很少到军府,接替严武的郭英义也是杜甫的旧友,严武死对杜甫并不构成危机。

金著《杜甫诗传》后记,有一大段说到拙文的见解,提到傅璇琮先生、袁行霈先生对拙说的肯定,认为此问题“牵涉到对杜甫后期思想行为的理解”,“需要重新解读,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”。

他看到杜甫“离蜀后病滞途中,有两大心事牵挂于心:一件是关心时局变化,不时忧国忧民;另一件就是想归朝履职,实现人生理想。他在诗中有数十处写到自己离蜀是为了归朝履职,并为因病滞留途中不能回朝而感到焦急,感到遗憾。”他又说:“我写这本杜甫传记,就是依据陈尚君教授的研究成果,用作品演绎杜甫后期的思想和行止,凸显杜甫始终坚守扶君济世理想的本来面目。这可以说是这本杜甫诗传的新意所在。”

金著《杜甫诗传》不足20万字,追求“雅俗共赏”,分23节,务求深入浅出,文字清简省净,对杜甫一生的叙述能从大处着言,于细处分析。全引或节引杜诗超过300首,都有很好的解读。全书不加注释,但能把握学术分寸,看得出做过大量的前期文案,符合当代西方传记虽无繁琐考证,前期文本的详尽推敲一点也不从省的做法。

即如前述参取拙文对杜甫离蜀后经历的四节叙述,在在都有对拙说新的补充。金先生认为,杜甫在永泰元年初已辞别严武幕府,所授郎官“检校意为察看、办理,检校官并非虚衔”。他对《客堂》诗的解读,与去年末我在《古典文学知识》新刊《客堂》:杜甫生命至暗时刻的心声》一文所见基本相同,他成文肯定在拙文刊出前。他推测杜甫发病始于忠州,

云安期间不堪杜鹃啼叫是“思归心切”。云安冬春间,始终想抱病人入朝,但病体孱弱,力不从心。他读出《别蔡十四著作》是送友人入京,顺便表白自己虽不能入朝,可提出蜀事安危的见解。在《夔府情系故国》一节,他用新说对杜甫一系列重要作品有全新解读。如读《暮春题瀘西新筑草屋五首》,看到杜甫有济时之策可陈,只因病留峡中,“悲叹朝宗无期,只有中宵泪洒床席。”对《夜雨》《更题》《复愁》等诗,也有很好阐述。对杜甫在江陵之委屈,在公安之穷途,在岳阳之徘徊,入湘后之狼狈,更能作全景式的展开。稍感遗憾的,估计因此传定位的缘故,对杜甫后期最宏阔壮丽的诗篇,没能展开论列。

金涛先生是浙江义乌人,原名金竹槐,工作后改名金涛,字涛声,以字为笔名。他是北大文献专业早期研究生,曾任职于中华书局。因故到广西。宁波大学成立不久,他东行任教。我与他熟悉,始于1986年共同参与周祖谟先生主编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·唐五代卷》,他负责初唐部分,达到很高水准。他曾整理《陆机集》,难度很高。20多年前我与他都参与《全唐五代诗》编纂,他承担王勃、杨炯二集。我得缘见过他的工作稿本,在大开本中将底本粘贴于中页,各本异文分次标出,工作极其规范。20多年前,傅璇琮先生在宁波东钱湖开古籍提要会议,我与他接谈稍多。不意多年过去,他也遭遇一些变故,仍能以其耄耋笔耕不辍,在他的新著中,确能读出“文章老更成”的意味。真为金先生高兴,更颂福寿康怡,学术常新。

(上接第一版)

在胡先生门下,家父在学术上初露头角,如《战时金融论》《当前的动力问题》等书相继出版。

学而优则仕 当官非所愿

但是,行政院小职员的工资完全不能养活三口之家。后来,祖父母又来重庆投靠小儿子,经济更加拮据。恰好这时,家父的第三位贵人适时降临,他就是隶属江浙财团圈子的浦拯东先生,时任重庆总电力公司总经理。浦先生读到家父写的财经文章,非常赏识,就设法把家父调到身边,当了一名新旧文章都是拿手好戏的大秘,工资也一下子涨了25倍!

也就在这时,发生了一件后来直到现在还在传扬的事。

抗战胜利后,毛泽东应邀飞赴重庆,与蒋介石进行谈判。他住在桂园,我家就在山坡下面。负责保卫的蔡团长是家父表叔,一次来我家闲谈,说起毛先生的保卫工作很不好做,因为他黎明即起,且喜四处走动。家父说这不难办,我写一条子,你放在毛先生书桌上,他就不会再乱走了。蔡团长姑且一试,果然灵验。就来问个究竟。原来,纸上写着“晨风加厉,白露为霜。伏莽堪虞,为国珍重”16个字,家父用了《书经》里的典故“伏戎于莽”(草丛里隐藏着兵器)。毛泽东一看即明白。

重庆选派接收敌占区的官员。上海是重中之重。浦先生就任上海市财政局长,让家父任主任秘书,实际上主持局里工作。此后四五年是家父在财经方面的著作

大丰收时期,除了引起马寅初先生关注的报刊文章,《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奴隶制问题》和《中国物价史》两本专著相继出版,奠定了家父作为财经学家和财经史学家的地位。

接收大员是肥差,上海的接收大员更是极品肥缺,有所谓“五子登科”之说。家父也遇到了一件咄咄怪事。

1945年9月底,自称“渡边”的一日本人来到办公室指名要见家父。家父首先叫他改说英文。渡边总结巴巴说,他是日本驻上海“居留民团”的头子,有一张支票要“送”给局座。家父马上叫来国库专员,支票“立即入库”。原来,日本在上海的全部工厂商铺等企业,它们的税是不缴给上海市政府的,而是由特殊机构居留民团收缴。这张支票就是上海开埠以来所有日本企事业的全部税款,款项之大简直可以挑战读者的想象力了。

家父任职于政府部门,但最感兴趣的还是读书和写作,很少应酬。星期天,他基本上在建国西路茂龄别墅26号那间房子二楼书房里度过。

屡屡佩青睐 大势却清楚

这时,家父生命中第四位贵人露出身影了,他就是“最有美国范”的上海市长吴国桢。

吴国桢也是从中文水平上欣赏这位小他十几岁的“小老弟”的:家父代表财政



钱剑夫先生与夫人蒋兰(摄于1948年)

局写的上报市府的呈文水平最高:要言不烦而文从字顺,自然给讲究文字的吴市长留下深刻印象,在市办公会议上经常点名让他发言。

1949年5月上旬,吴国桢突然找到家父,问他“走”还是“留”?

有了上面在重庆对于毛公的那番故事铺垫,不说也猜得出家父对于吴国桢是如何一番婉拒的了。

1949年后,家父曾与新政权派来接收财政局的顾准先生共事一段时间,留下了

对于中共高级财经干部的有趣回忆。

后来几经折腾,家父当了中学语文老师。这期间,他结合教学,悉心钻研自小喜爱的文字训诂之学,同时旁及早年致力过的中国经济史,文史贯通而常有振聋发聩的论文问世。

这时,他的第五位也是最重要的贵人出现了,那就是吕叔湘先生。

说来我也算是吕先生的一名“私塾弟子”。家父和我各有一篇怀念他的散文,同时收入《吕叔湘全集》。

终于致大用 实至必名归

吕先生对于家父几篇讨论古籍校注的文章评价很高。在他的奖掖拔尤之下,家父被聘为《汉语大词典》编委和分卷副主编,并进入上海文史馆,晚年可谓否极泰来,实至名归了。这前后,他的《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》《秦汉货币史稿》和《秦汉赋役制度考略》陆续出版,还写了一本《对联大观》,为其五岁时就会对对子的佳话作了最终的佐证。

家父一辈子虽有飘茵落溷之处,其实也是儒家子弟典型的一生。子曰:“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,不可以长处乐。仁者安仁,知者利仁。”我想,家父是做到了的。

所以,表面上看,他不跟命运斗争,其实,不管是在茵席之上“处乐”,或者藩溷之侧“处约”,他都把握好了自己,坚守底线而在学术上有所追求,根据客观条件最大限度地作了一个学者应做的事。

这点,恐怕非我辈所能及。所以,写出来以飨读者,也许还是有点意思的。